

回归家庭教会传统

——探索当今中国城市教会的出路

吕居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人口日益往城市迁移，城市教会的发展成为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重心。如何发掘使徒时代教会的原生传统，有效克服现今城市教会发展过程中的障碍，这不单关乎神的国度在现今中国的兴衰存续，也关乎中国社会未来的长治久安。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也是中国社会的希望。如果中国社会有着强大而为数众多、信仰纯正的教会，并由此衍生出众多的类教会机构，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健康的中间力量。这些信仰公益力量位居于巨无霸的政府和柔弱个体蚁民之间，缓冲各种社会矛盾，改良中国社会的结构，将会为整个社会带来诸多恩典与祝福。然而，现今中国都市教会的发展，却遇到了诸多困难与阻力。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会过去四十年发展轨迹的梳理，并由此追溯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发展模式，试图从这两个制度环境同样恶劣、但教会发展都很迅猛的历史时期，找到教会发展的共通特性。这些分析比较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就是制度环境的压力并不能阻止教会发展，教会在这两个时期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一种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这种组织模式在这两个历史阶段成功规避了来自政权和制度的强大压力，让教会在私人 and 家庭空间里得到细致、扎实、稳固地发展。公元313年米兰赦令的颁布，从根本上改变了教会生存的制度空间，教会从此进入公共领域，其组织模式也从庭教会逐渐演变为建制教会。然而，建制教会的构建与理念，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格格不入。总体而言，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为建制教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足够得空间；今天的中国教会仍然处在为奴、被掳、受压制的不自在时期。基于对时代特征的认定，本文认为，中国教会应该回归四十年前的家庭教会传统，并进而追溯到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传统，让教会化整为零，进入各个家庭，建立小型的家庭教会，这种模式可以帮助现今的中国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在现有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之下，找到生存与繁荣的空间，减少损耗、健康发展、更加兴旺。

一) 当今中国城市教会遇到的挑战

当今中国城市教会主要面临政权逼迫和经济压力两方面的挑战。来自政权方面的逼迫是显而易见的。近期国内政治思想领域的大致走向，呈现向原教旨共产主义回归的趋势，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担心文革再度回潮。在这种大趋势下，浙江、河南等地出现强拆十字架风潮，一些与基督信仰相关的标志遭到损毁，政府强制在聚会场所安装摄像头，多处三自教会门口摆放着谢绝公务员和未成年人到访的标牌，全国多处教会学校被勒令关停，各地陆续出现公务人员闯入聚会场所，阻挠干扰正在进行的崇拜聚会。种种迹象都表明，家庭教会在当今中国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受到严重压缩与排挤。不过，即便政治权势日益侵蚀信仰空间，但世俗政权力量很难全面渗透进入家庭的堡垒。2018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宗教条例，其中可操作的条款，大部分都是针对正式宗教场所和大型宗教活动；对于家庭餐桌上的信仰教导，以及熟人朋友之间的信仰探讨，没有也无法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即便像这种限制信仰自由的宗教法规，对于以家庭成员及亲友组成的家庭教会，也没有明令

禁止。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对基督信仰实施系统打压与限制，但基督徒人数迅猛增长，这显然不是建制教会的福音成果，而是得益于家庭教会这种模式。一世纪的初代教会和上一世纪的中国教会，都是教会快速增长的时期，而两者都因为政治高压而不得不采用家庭教会的聚会模式。这些共同的现象，不由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联想：家庭教会的模式并非政治高压下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而是教会迅速增长的有效模式！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家庭教会在一至三世纪罗马帝国的持续高压下蓬勃兴旺，也在过去七十年中共政权的逼迫歧视之下游刃有余，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今天中国政府对教会的新一轮打压，家庭教会仍然是上帝为我们开通的、没有人可以阻断的教会发展模式！

当今中国城市教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经济压力。日益增长的场地租金，让多数城市教会不堪重负。笔者走访过一些大中型城市，那里稍有规模的教会，月租金一般都会过万，有的超过3万，个别比较大的教会，每年房租竟然达到300万元。某都会城市教牧联祷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各教会房屋租金占有所有奉献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70%！支付房租之后剩下的小部分资源，并不足以支付传道人薪酬、福利，以及日常运营开支；基本没有能力展开福音外展、植堂宣教等正常事工。这种严峻的经济压力，其直接后果是拉低教会全职同工薪酬福利，让牧会成为难以养家糊口的艰难事业。现实的经济困难让许多有心奉献的年轻同工望而却步；长此以往，教会将缺少优秀的全职工人，所造成的损伤难以估量。尤其是一些以学生为主体的教会，奉献收入本来就有限，再加上高校区的房租相对较贵，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这些教会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现今的高房价、高租金给城市教会带来的压力是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乃是回归家庭教会传统，化整为零，在家里聚会。如果是学生教会，可以组织学生同工一起租住整个单元，把生活、门训及聚会场所合而为一，这样就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场地租金，把省下的资源有效应用在更迫切的各项事工上，使得教会在小组、门训、宣教等方面取得突破；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供应传道人的合理需要。抛开上述政治高压因素，单单从经济方面考量，回归家庭教会的发展模式，对于现今中国的城市教会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

当今中国日益收紧的制度空间，给未成年人的福音事工造成极大的困扰。据传河南省两会于2018年4月发布官方文件，称未成年人进入教堂是“红线高压线”，如果违反规定，将严厉查办教会牧职人员。这种传闻从河南一些三自教会院内竖起的告示牌得到证实。此外，浙江温州市逾百基督教堂早在去年8月就接到当局警告，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可以预见，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任何建制性教会的儿童和青少年事工都面临严重压力。政府的这种规定，直接与耶稣的教导相违背，马太福音19:14那里，耶稣明确教导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国正属于这样的人”。当属世的法规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的时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在现今的制度环境下，把未成年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归传统的家庭教会模式。家庭内部的信仰传承，以及小规模的家庭教会，是该撒强权鞭长莫及的领域。而初代教会的信仰传承，主要就是通过家庭及家庭教会实现的。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信仰传递模式，威力巨大。尽管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就开始给学生灌输无神理念，但幼儿园之前的时光，以及孩子们放学之后在家的时间段，父母仍然可以对孩子进行信仰方面的教导和栽培，任何稍有理性的法律或法规，都无法强制清除出现在亲子间、餐桌上信仰教导。在犹太人亡国被掳的极端情形下，其信仰传承主要就是通过这种家族亲子纽带。笔

者近期访问过一个学生团契，二十多位同工，无一例外，都是从父母家人那里传承而来的信仰，这些年轻人的信仰扎实而稳固，都是学生团契的中坚力量。圣经里有明确的教导，传承信仰主要是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摩西在申命记告诫以色列百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命记 6:5-7）。

二) 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

初代教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应该是耶路撒冷教会，被称为其他教会的母会。这个教会的核心成员由一百二十位跟过耶稣的加利利籍成员所组成，其中包括十二使徒、耶稣的亲属。使徒时代教会的增长速度很快，五旬节那天彼得讲道之后，就有三千人悔改受洗（徒 2:41）；这些门徒组成信仰与生活共同体，这个群体的人数天天加增（徒 2:47）。随后，彼得行神迹医治美门旁边的瘸子，在那次的讲道中，又有五千人信主（徒 4:4）。如果把这些数目加在一起，耶路撒冷母会的基督徒人数应该不下万人，这在今天也算得上是一个超大型教会了。但上帝似乎并没有以超自然的能力保守这个大教会不受政治势力的冲击。司提反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这个大型教会遇到逼迫，“…除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徒 8:1）。面对严峻的信仰迫害，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并没有对罗马政府的强权迫害大加挹伐，反倒顺着福音从耶路撒冷扩散出去的线路继续追踪记载。通观全书，路加显然意识到上帝的旨意并非要让门徒聚在耶路撒冷组成大教会，抱团取暖。上帝的旨意是要让门徒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根据有些学者对使徒行传主题的诠释，组成使徒行传的六个部分，每一部分末尾都反复再现这样的主题：“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6:7），“…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人数就增多了”（9:31），“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12:24），“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16:5），“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19:20），“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28:31）¹。路加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没有把记述重心放到对政府逼迫的抗议，或者沉迷于耶路撒冷大教会的宏大规模；他所关注的是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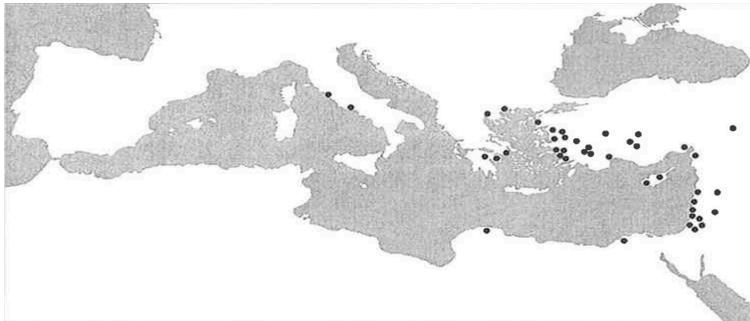
在上述主题的带领下，路加继续描述福音外展的地理与族群轨迹。分析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教会的发展模式，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内聚不是上帝的旨意，外展才是。耶稣在大使命中所使用的第一个动词是“去”，而且是往“万民”中去；复活节之后的这种离心模式（Centrifugal）与旧约万民流归耶路撒冷的向心模式（centripetal）形成对比。路加描绘出上帝的心意，上帝不在乎单个地方教会的规模大小，上帝在意的是纯正的福音如何传向所有的族群、如何传向地极。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充满外展异象的中小型教会，比以内敛为主要特征的大型教会，更符合上帝的心意。这就可以解释路加对耶路撒冷大教会遭受政治逼迫的记载中，并没有对犹太傀儡政权或罗马政府提出抗辩或指责，对庞大的耶路撒冷母会遭遇逼迫而不得不四散分离丝毫没有表示惋惜。如果从全书的整体结构来分析，我们甚至可以读出这样的意味——耶路撒冷大教会遭受逼迫而四散的这种离心轨迹，符合上帝想要让福音传遍地极的旨意。在路加看来，为了维护教会规模而盲目与政府对抗、以受害者身

¹ Gordon D. Fee & Douglas Stuart, “Acts: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Precedent”, in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3) p.94-112.

份占据道德制高点谴责政府、或者裹挟教会达到个人或族群的政治目的，这些做法反倒与上帝在大使命及使徒行传 1:8 那里所表达的神圣救赎计划背道而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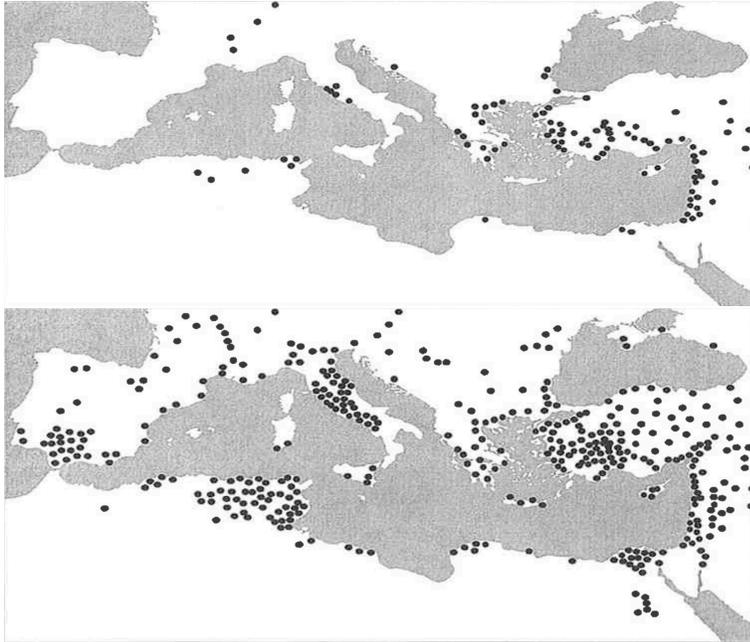
根据使徒行传的整体结构与主题，使徒时代的关注重心并不是建立大型教会。一些新约学者推断，初代家庭教会的平均规模，大约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间。² 罗马、哥林多、以弗所等一些较大的城市里存在着多个这样规模的家庭教会。罗马书 16:3-5 记载在百基拉和亚居拉家里有家庭教会，歌罗西书 4:15 那里提到宁法姐妹家里的教会，腓利门 1:1-2 显示在腓利门家里也有家庭教会。保罗在他的书信问安语中，总是亲切地问候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罗 16:3-24，西 4:10-18，门 23-24）。这些周详的问安语让人感受到初代教会家庭亲情一样的温暖；同时也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这些家庭教会的规模并不大，具有牧者心肠的保罗熟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的状况。此外，哥林多前书 11 章指出该教会内部存在“分门结党”的现象，这些“党派”很可能是指哥林多教会下辖的各个家庭聚会，这些家庭聚会各自受接待家庭的人脉关系和神学观点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党派门类。这些小型的聚会平时在各自的开放家庭活动，但为了圣餐等原因定期或不定期地聚集在比较宽敞的地方。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使徒时代的教会其实就是家庭教会，它们的规模一般都不超过一百人。较大规模的家庭教会通常由小单元的分支家庭教会所组成，小型分支家庭教会的组成人数约从十到四十不等。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规模家庭教会，日益传播、迅速繁殖，从主后一世纪到三世纪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如繁星点点散布在地中海沿岸。随着教会数目日益增加，基督徒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到三世纪末期、四世纪初期，基督徒约占罗马帝国总人口的 10% 左右，成为一支强大的同质 (homogeneous) 社会力量。以下是一些新约学者根据早期家庭教会史的相关资料而制作的三幅示意图，分别代表主后一世纪、二世纪和三世纪的家庭教会在地中海沿岸的发展和分布情形：³



² Paul Barnett, *Jesus & the Rise of Early Christianity, A History of New Testament Times* (InterVarsity Press, Downers Grove, Illinois, 1999) p. 368.

³ *Eerdman's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rganizing editor, Tim Towley; consulting editors, John H.Y. Briggs, Robert D. Linder, David F. Wright (Eerdmans,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7) p.66-67.



上述示意图勾勒出初代教会头三个世纪的迅猛发展，图中黑点所代表的教会，大部分都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家庭教会。当然，初代的“家庭教会”，并非严格意义上以自然家庭为单位的教会，而是指以数个家庭或一小群基督徒聚在一处，在某个信徒家中聚会的小型团契或教会。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家庭教会的生命力是如此强劲，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基督徒人口在罗马等重要城市不可遏制地壮大，引起了当局的恐慌。主后 64 年尼录皇帝为嫁祸基督徒而纵火焚烧罗马城，罗马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在描绘这一历史事件时候提到基督徒群体，说他们是“无比巨大的一个群体”，正在遭受定罪与处决。⁴ 随着教会数量和基督徒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与政策，从最初的打压、逼迫，转为吸收利用。主后 313 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逐渐取得合法地位，并进而被尊奉为国教，从此进入另一种发展环境。

三) 回归家庭教会传统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进入国教时期的基督信仰，渐渐转离家庭教会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容纳吸收周围环境的制度因素，形成各式各样的教会建制形态。大体而言，进入国教时期的教会，搬进豪华壮丽的殿堂，仿效罗马帝国的行政构架，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在随后发展出来的神学理论支撑之下，这种构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得到提升强化，即便后来罗马帝国消亡，帝国式科层结构也得以完整保留，这就是今天的天主教会。与天主教类似，英国圣公会产生于英国王权与梵蒂冈教权的争执，随着英国国王在争执中占据上风，圣公会脱离天主教，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当时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带有明显的行政科层结构特色。路德宗也是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两者之间除了教义差异，同时夹杂着民族独立、税收利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路德宗在

⁴ Tacitus *Annals* 15.44.2-5.

强调教义特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天主教的礼仪与制度构架。直到今天，路德宗在德国的新教区域仍然享有官方教会的待遇，故此，路德宗的制度构架也同样带着行政科层模式的烙印。对于改革宗教会，其理想构架是仿效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城邦所实行的政教合一模式。这种制度显然带有议会制的痕迹，议会制与贵族制关系密切，这些都是以长老制为主要治理模式的教会构架特色。至于稍后流行起来的公理会教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十七世纪时期的清教运动，经以五月花号为代表的移民群体，进入北美新英格兰殖民地，渐渐推广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教会治理与构架模式。公理会的治理构建体现出个体独立、契约民主、会众自治等源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新兴政治理念。

通过对上述各种教会结构模式的简略分析，我们观察到这些模式背后的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它们都深受所处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及行政模式的影响，添加入许多人为的因素。也就是说，地域、文化、历史机遇等偶然性环境因素促成了各种教会构架的生成。无论是天主教、圣公会、路德宗、改革宗还是公理会，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几乎都受到某些政治力量的支持。教会接受强力支持的同时，也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强力结构的改造，有时甚至是全盘照抄世俗权力的结构特征。纵观整个教会历史，唯有初代教会的结构呈现自然生长的原生特性。尽管初代教会处于罗马政府的强力逼迫之下，不得不应对世俗强力的挑战，但初代教会的自然结构基本没有受到世俗强权的侵入或复制。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约使徒时代的教会结构带有原生态特征，并且蕴含强大的外展生命力。使徒时代的政教关系和教会构架模式，在过去四十年的中国教会历史中再次上演。中国家庭教会在充满敌意的共产无神政权的逼迫与歧视之下，和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发展迅猛、不可遏制。家庭教会模式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同样令人惋惜的是，和教父时代后期的教会一样，中国新兴城市教会所走的道路，追随仿效的，乃是主后四世纪国教化以后的教会构架。城市教会的传道人普遍受过西方神学教育，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头脑中不知不觉形成的默认(default)教会模式就是堂会式的建制教会。城市教会传道人头脑中的这种默认教会模式，一方面来源于他们所受过的西方神学教育；另一方面也受到人性深处建功立业的生存焦虑所驱遣，许多传道人都怀揣建立大教会的梦想，有意无意地以韩国、美国近年出现的巨型教会(megachurch)为榜样，仿佛只有建立起那样的大教会，才是蒙上帝喜悦的明证。很少人意识到圣灵藉着初代使徒们所展示的建堂和植堂模式，乃是家庭教会的小教会模式。而家庭教会模式的最佳模型，并不在今日的欧美或韩国，而在中国的农村，而在路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里面！即便是精通神学、装备精良的改革宗牧者，他们在提倡“回归本源”(ad fontes)的时候，所指的也只是回到加尔文日内瓦时代的议会长老制，而不是加尔文等改教家在他们的时代所提倡回归的使徒传统。我们的眼光，应当穿透美韩和欧洲，投射到使徒时代的新约教会；我们所应当效法的教会模式，首先不是在教会历史的后来阶段所形成的与世俗政权互动妥协之后的模式，而是过去几十年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家庭教会的模式，因为这是教会原初成长的自然模式，也是圣灵藉使徒们所展示的原初模式！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倡导在教义层面回归使徒时代“因信称义”的纯正信仰。然而，我们今天要倡导另一种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就是教会制度层面的改革，就是越过教会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堂会、宗派建制构架，回归使徒时代教会的原生态构架。同时也肯定中国农村教会过去几十年所走过的传

统。中国教会的本土资源和使徒时代的原生态资源遥相呼应，呼唤我们回归家庭教会传统。

需要说明的一点，笔者对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堂会制度、科层结构、宗派体系，并无特别成见。这些制度是教会原生态创造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地理氛围中的延展，是教会作为神圣有机生命体在历史中呈现的发展模式，在各个历史时代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教会历史上的这众多资源，都是中国教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借鉴。我深切地期盼，中国的政教关系也能健康互动，并在具体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独特的教会构架，让神的教会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迅猛生长，让教会先知式的声音进入公共广场，让弥赛亚国度公平公义的光辉，照亮人心、祝福社会。

然而，在现今世俗强权逼迫教会日益沉重的情形下，回归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模式，不但可以化解世俗强权的迅猛攻势，而且有利于教会更新复原，以原生态的健康活力，获得比过去四十年更大的发展成果，让使徒行传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得以延续。初代教会与世俗强权的互动模式，与过去四十年中国家庭教会生存的制度环境极为相似，也与现今中国教会的生存状态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基于此种对时代特征的解读，笔者认为回归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传统，是目前中国教会的正途，尤其对中国新兴城市教会而言，更是如此。